

6024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是一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周 域

云 南 民 族 学 院

1991年7月

论文提要

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历史经验。说明这一制度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它早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第二部分，从深层次上论证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点，从四个方面阐明了我国实行这一制度的好处；第三部分，剖析和阐明了为什么在我国绝不能搬用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只能和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

周 域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它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对于这样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并使之不断完善。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对它竭力进行攻击、否定，妄图在中国推行西方的多党制。给人们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是不可低估的。为什么在我国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给以廓清。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它早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之中。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有长期合作，并肩战斗的历史。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最终走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下，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我国今天的八个民主党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在国共两大党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大多数是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形成的”^①。在成立时其性质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党派，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的性质，“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

“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②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活动方式，在各自所能活动的范围内活动，这就形成了规模成份不等的八个民主党派。而中国自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政治舞台上起支配作用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战争成为中国人民实现革命总任务的主要形式。这就给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没有留下多少活动的余地，并给以深刻的影响。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的是一党专政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不允许党外有党。中国共产党有军队、有根据地尚被国民党反动派不择一切手段地要加以消灭，而民主党派一无地盘、二无军队，其地位更是岌岌可危。他们要想在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便选择了靠拢中共与之合作并肩战斗的活动走向。加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她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③，“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④。这就给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共事、并肩战斗的关系由可能变为现实。早在国民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关系就开始奠定了。现在我国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就是在此期间于1928年春成立的。主要领导人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中华革命党为了复兴中国革命在对时局的宣言中就认为：“革命势力有急速集中以促中国革命运动复兴之必要。我们更希望革命的党派，抛弃他们错误的策略，建立革命同盟，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以完成中国革命现阶段之使命”⑤。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的航程中又增添了一个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党。而它，是愿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1930年8月，邓演达等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该党以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为主要目标，主张进行“平民革命”，用武装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平民政权”，使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⑥。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为适应“九·一八”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该组织提出了“倒蒋抗日”的十条行动纲领，先后参与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的抗日反蒋斗争。在此期间虽然由于中共主要领导人在策略上有“左”的倾向，使两党并肩战斗的关系未能尽如人意，但总体上看，“第三党”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对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策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等从《宣言》中受到很大鼓舞，他们经过讨论，共同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实行抗日，而要实行抗战，就必须联共，要联共，就必须立即组织起来，以便同共产党和全国抗日力量结成反日阵线”⑦。于是在同年11月10日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积极响应《八一宣言》，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方针。自此，与中共团结并肩战斗的关系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于1947年2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国又先后产生了一些民主党派。1941年3月由张澜、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等发起的以“三党”（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三派”（抗日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宣告成立。它的成立，立刻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欢迎，《解放日报》在3月28日发表社论称赞民主政团同盟是“中国民主运动之生力军”，指出，它对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1944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号召。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友党，相互密切配合，并肩战斗，以致到1947年7月，

蒋介石对不愿意同他合作的民主党派进行镇压时，国民党当局甚至把民盟污蔑为“新的暴乱工具”是“中共的尾巴”，是“奸盟”^⑧。10月竟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严加取缔”。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国政治舞台上先后还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16日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12月30日成立）、“九三学社”（1946年5月成立）、“中国致公党”（该党最早成立于美国旧金山，1925年10月成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活动停顿。1947年5月重新登记后恢复活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11月12日成立）。它们成立后，与早先成立的其他民主党派一道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和合作，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表现了鲜明的正义感和革命性。在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石国民党处于崩溃前夕，1948年1月还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它是从原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三个民主党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联合组成的。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等为委员。“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它爱国民主分子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公开决裂，从而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它一成立就立即投入“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斗争，成为中共的亲密友党。至此，我国现今的八个民主党派就全部形成了。到了1948年5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当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时，上述这些民主党派都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起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派出自己的代表进入解放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民主党派就是在国共两党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在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和合作，并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尽管民主党派成立时，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与中国共产党是不尽相同的，多走过了一个曲折的道路，但是，不论那个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的斗争中，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好朋友。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与我国民主党派就有党外长期合作，并肩战斗的历史，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就创造过与民主党派在政权中的合作形式，即“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在民主政权中不是实行清一色的共产党人，而是由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别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⑨。如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按“三三制”，18名政府委员中，中共只能有6名，可是选来选去仍占7名，共产党人徐特立立即声明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替补^⑩。选举的结果，由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付主席，非党民主人士安文钦当选为边区参议会付议长。在晋绥边区，开明绅士刘少白当选为临时参议会付议长，爱国抗日将领续范亭当选为行政公署付议长。在晋冀鲁豫，老同盟会员邢肇棠当选为参议会付会长。^⑪坚持这种制度的结果，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抗

日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以后，随着抗战的胜利发展，以及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危机，中共中央曾试图把这种政权形式加以丰富和发展并推行到全国范围去。1944年9月，在国民党参政会上，通过自己的代表林伯渠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这种政权形式还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不应该是一个阶级的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而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⑫，具体作法是：第一步“成立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⑬以后，第二步“到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⑭。鉴于国民党蒋介石拒绝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坚持国民党一党独裁，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发动了反革命的内战，一意孤行，所以，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1948年5月发表的“五一”口号，才提出组织没有国民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自绝于人民的结果。它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人民的唾弃。

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严格履行了团结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方针。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民族和国外华侨及其它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通过了《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会上八个民主党派一致公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也就成为各民主党派自己的政治纲领。也就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统一战线在建国后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民主党派与中共进行政治协商，在中共领导下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成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明确肯定了建国后“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⑮。自此，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格局就初步建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坚持并且发展了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在建国初期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程度是较高的。民主党派和非党民主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政府中任职人数也较多。如在中央人民政府六名付主席中，有三名是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在五名付总理中，有两名非中共人士（黄炎培任政务院付总理、沈钧儒为最高法院院长）；三十二个部级单位中，正副负责人非中共人士十三人，占43%^⑯。

民主党派在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及社会主义改造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监督作用，中共还经常化、制度化的召开民主党派参加的“协商讨论会”、“双周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就国民经济的恢复、上

改、“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决策，广泛征求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意见。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还身体力行，对民主党派在生活、工作中的困难给予关心、帮助，与各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关系密切，常聚集一堂，共商大计。到了1954年9月，我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了过去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行宪法的时候，大会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仍明确规定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仍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也规定了人民政协继续参政议政，并在同年十二月召开二届政协会议。继续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责和神圣使命。

1956年，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已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随着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共领导下以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为主体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了。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又及时地正确解决了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肯定了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①，从理论上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57年三月政协第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也如期在北京举行。

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方针上犯“左”的错误，我国的多党合作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民主党派受到了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更严重破坏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一度丧失了一部分主动力。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又使一度被削弱的这一政治制度很快又恢复了它固有的强大生命力。1978年二月，中断了多年的政协第五届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共十二大还把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方针，发展深化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共十三大又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作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作了强调。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复兴、祖国的繁荣昌盛，中国共产党在征求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的意见之后，1989年十二月三十日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可以说，这个文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的产物。它的公开发表，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维护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决心，使我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完善。

我国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后到今天，它象一株大树一样，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它的成长不仅是中共为坚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所作的创造性的重大功绩，也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中共亲密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为这棵大树的成长，也施了肥，浇了水。总结建国以来

实行这一制度行之有效的经验，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到今天，它的内在机制、功能和特点主要有：第一、共产党是执政党，它在中国的各党派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不是各党派轮流执政；第二、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和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结成政治联盟，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合作的前提，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以中共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为共同的政治纲领，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第四、政治协商、互相监督是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共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第五、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是人民政协，它成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物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所有这些，无疑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成功创造。总之，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分析的，这个制度“基础是牢固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前景也是广阔的”^⑮。

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

第一，有利于在全国形成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群众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强大的凝聚力，不致出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那种党派竞争、倾轧、争权夺利，使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的现象。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它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参政议政的地位。就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目标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它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⑯这种情况也正如我国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回答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说的：“如果照先生看来，凡是政党，必定有在朝在野之分，必定要互相夺取政权，那你们是不理解我们的”。“我们与西方国家政党的区别就在于不是为了获取某党派的政权去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是参加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权，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所以我们不存在在朝在野的问题”。“在我国不存在反对党”，它“既无条件也不需要”^⑰。

第二、这种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广泛的人民民主，有利于反映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党和国家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业的权力。在我国除了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还实行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诚心诚意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参与政权，参加国家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它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加以坚持使之不断完善，这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发挥各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作用的形式，是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的一种补充和发展，这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史上也是一个成功的先例。

我国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加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议商，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①。而“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同人大、政府互为补充，相辅相成”^②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通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广泛听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进行决策，由人民政府执行实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集中体现了我国广泛的人民民主。现在，在七届人大常委会十九名副委员长中，民主党派有七名，占36.8%。在七届政协二十八名副主席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成员十五人，占53%。在七届全国人大2970名代表中，有民主党派成员540名，占18.2%。还有5000名成员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政协2081名委员中有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1249人，占60%（其中民主党派成员701名占33.7%）。全国政协35万名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63%。一九八八年国务院任命民主党派成员分别担任三个部的副部长（如民建中央副主席冯梯云就担任监察部副部长）^③，上海的一位副市长是九三学社的，北京也有一个党外副市长。各民主党派成员中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职务的占本党成员的比例也在增加，如农工民主党有3700多人，占该党总人数1/10；民进3100多人，占该党总人数13%^④。比例可谓可观。今后，还将有更多的民主党派优秀人才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中共中央就国家大政方针等问题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进行协商制度也正逐渐完善。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召开各种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就达四十多次。其中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近一年中，就召开了十五次^⑤。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就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积极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的政策性建议。如一九八二年修改宪法，民主党派提出修改意见1200多条，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包括科技体制改革、教育、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和西南地区的开发、人口问题、振兴我国中医中药等有7661项，其中75%的提案已被采纳^⑥，付诸实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就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

第三、这种制度，能发挥政党的群体功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基础上，互相协商、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长处，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避免一党执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失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它领导着11亿人口的国家政权，很需要听到各种意见和批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能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发挥监督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而人民政协，它对国家大政方针、地方重要事务、政策法令的贯彻、群众生活和统一战线中的重大问题不仅赋有政治协商的权利，而且负有民主监督的任务，它本身就是实行多党合作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监督作用，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时就强调说，党要受监督，“要

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当特别警惕”，“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②7}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干部会上阐述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时也强调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指出：“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②8}，他还说：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除了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第三就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②9}。现在，我国的民主党派已把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发挥监督的职能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中共中央还规定了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③0}。并指示：在政协的各种会议上，要切实保障政协委员提出评比的自由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③1}。目前，各民主党派中央都建立了举报中心：第一批二十一名各民主党派成员受聘担任国家监察部特邀监督员，各民主党派一批成员还担任省、市、自治区监督部门的特邀监察员；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了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和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

第四、这个制度还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服务。各民主党派拥有密集的多学科的较高水平的经验丰富的人才，人民政协也汇集了社会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代表人士，也是一个综合性的、高层次的智力库。全国民主党派成员达33.7万人，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各民主党派人员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如民盟中40%以上有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记者、高级编辑的技术职称，或者著名作家、艺术家^{③2}。近年民主党派吸收的新成员（或称会员）中也有相当部分为各界学有专长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各民主党派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开展各方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作。十年来，仅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全国开办的科技、经济咨询机构达1138个，开展咨询服务项目16942项，设立各类专业培训班8622个，培训人员近17万人；举办各种技术讲座8100次，受训人员120多万人次。举办学校1222所，毕业生241万，在校学生8.4万人^{③3}。这些学校不要国家投资，培训的学生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成为各地欢迎的人才。民主党派还发挥自己海外关系较多、在国际上也具有广泛影响的独特优势，竭力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以原国民党中上层人士为主体的民革已协助引进外资4亿美元，主要成员为归侨、侨眷的中国致公党则引进外资8.7亿美元和4.6亿人民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充分利用两岸关系日益缓和的有利时机，近两年就协助引进外资1400万美元。广东省引进外资40多亿美元，其中有一半以上就是通过民主党派和党外

人士的朋友们协助引进的。十年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各界人士还派出10761人次到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智力支援,帮助当地建立各类项目3329项,兴办公益事业4414项^③。各地工商联还兴办了1200多家企业,安置城镇10余万青年就业^④。各民主党派还加强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外籍华人华裔的联谊工作,促进海峡两岸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为推进“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积极开展各项活动。

总之,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党体制的一个创造,已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坚持和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对于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在我国绝不能搬用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

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鼓吹在中国推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是违背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是绝对行不通的,因而也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从历史上看,在旧中国时,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就尝试过,要把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搬到中国来,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种尝试都先后遭到失败,历史已经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在中国行不通。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从辛亥革命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试图把西方的多党制搬上中国政治舞台,比较有影响的有过两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失败前的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宋教仁就特别醉心于推行西方多党制,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就热衷于要在中国搞多党轮流执政的议会制。当时趁袁世凯一时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的局面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以及一些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人重新组合,纷纷成立政团和政党,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等几个大党,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党派林立的局面。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北京参、众两院议员进行选举时,国民党曾获得了292个席位,占绝对优势。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总共才占223个席位。宋教仁高兴地认为,只要不遗余力地扩大党势,以多数党资格组阁,便可以抑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专制,甚至利用国民党的多数席位,由国民党组阁决定袁世凯的去留。他为此奔走长江流域各地进行竞选游说,孙中山在国外也赞扬这种“竞争”。可惜革命党人没有意识到多党制在中国的命运是短暂的。事态发展很快打破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这种设想和愿望,国民党大选中的胜利,只能带来1913年3月20日年仅32岁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的悲剧结局。因为袁世凯决不允许这种妨碍其独裁统治的责任内阁制。不久国民党又被袁世凯宣布为“乱党”勒令解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进入国会的资格,致使国会无法召开。一九一四年当袁世凯正式窃取了正式大总统的职位后,连曾扶持袁世凯上台的保皇党也被一脚踢开。资产阶级多党制在中国便宣告破产了。西方多党制在北洋军阀时期之所以行不通,因为当时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所要建立的是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为了维护其反动的专制统治,他们不但不需要“激烈”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不需要“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国民党

派在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前有的人也曾追求着把西方多党制搬到中国来，在我国建立多党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再次尝试，但最后也只能是幻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个时期里，随着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暂时的和平以及国共两党出现了某种力量相对均衡的局面时，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中有的人就曾利用召开旧政协会议（即党派会议）的机遇，企图把西方多党制搬到中国政治舞台上，通过有共产党和民盟等参加的政协会议及所通过的协议，使民主党派“在野党”的合法地位得到切实保证，进而在中国实行他们提出的用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英美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正如周恩来同志当时在政协会议期间就对民盟朋友们所说的：“恐怕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也不可得了”^{②6}。周恩来同志当时就估计到蒋介石是不是会真正实施政协决议的，“中国的事情对蒋介石来说，签了字也是没有用的”^{②7}。果然，宪草协议通过后蒋介石坚决反对。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政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悬崖勒马，另行途径”^{②8}。其它反动分子也跟着叫嚣政协决议的通过是“党国自杀”。接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就通过了推翻政协决议，全面撕毁了政协决议，坚持国民党独裁。十二月甚至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迫使民盟宣布自行解散。国民党政府宣布绝不容许有任何普通民主国家所允许的反对派的存在。结果，短暂的民主党派“在野党”的合法地位便成了昙花一现。民主党派连自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在中国推行西方的多党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也就彻底化为泡影。其所以如此，因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既不允许共产党引导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也不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派别、党派走中间道路，建立多党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人民也不容许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政党轮流座庄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不定的同盟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由它去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人民群众不允许这样做，资产阶级及其党派也没有力量这样做。因此，多党制在中国在历史上就行不通。后来，严酷的事实使许多民主党派也深深感到，要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解放，只有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接受共产党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也只有这样民主党派本身也才有前途。

第二、从现实看，也不符合我国的情况。在我国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四十年来的今天，有人还想搞西方多党制，就根本违背了我国的现实情况。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从理论上说，它是违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的，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对立的，也与我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不容。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代替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才能保卫革命胜利成果，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

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它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事业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新型的民主制度，虽然还待于完善，但就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主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来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两党制只是资产阶级少数人当家作主，交替统治，而广大劳动人民倍受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相比是最先进最优越的民主政治。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人民民主制度不坚持完善它，反倒要去实行西方的多党制，那就意味着要在中国新培养一个资产阶级来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统治，使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被剥削被统治的奴隶地位，那将是历史的大倒退！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我国也根本不存在搞西方多党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怎么能够去搬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当然，不能否认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存在着多元的利益关系，这更要求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党不仅仅代表一种利益关系，而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它同多党轮流执政是不相容的。而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来协调社会主义的各种利益的关系，克服和缩小多元利益关系的矛盾，使之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而这样的政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她的纲领和政策，正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体现。历史早已证明，在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七十多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一个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重任，能够彻底解放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其它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得到全国人民真诚支持和拥护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⑨而作为各自代表某个社会阶层，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我网民主党派，在我国这个有11亿多人口，工人和农民占绝对大多数的国度里，它们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不具备单独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的。要在中国搞西方多党制也是违背民主党派的章程的，为各民主党派成员所不容的，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从其历史的发展中，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力量”，“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

至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由于党的性质、宗旨和纪律所决定，它在思想上政治上是高度一致的，组织上是完全统一的，在党内决不容许反对派存在。在工人阶级内部由于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因此没有也不容许在其内部还分裂成两个或几个对立的政党轮流执政。因此，在中国绝不能搬用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如果允许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

由化立场的人主张的那样，在我国搞西方多党制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就会造成党派纷争、秩序混乱、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无从谈起。

第二、从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剧变的教训中也给我们提供深刻的教训，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搬用西方的多党制，搞政治多元化。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来，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发生了激烈变化。尽管这些国家变化的方式、速度和程度有所差异，我们对那里事态的发展也还要继续观察，但从已经发生的变化看，其实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而是向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演变^①。很明显这是和平演变这一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战略在这个地区得手的结果。这些国家在短期内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长期积累的诸种矛盾在当前国际大气候下的总爆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内外反动势力面前，政治上不断作出重大让步，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所带来的恶果。以致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在法律上或实际上丧失领导地位，有的已经瓦解或者演变为社会民主党，进而使国家的性质也发生质的变化。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要加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党要加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这很重要。东欧的变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实行多党制，搞多元化。我们要坚持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是共产党自封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所有的共产党员千万不能忘记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②。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对于这样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我们要继续坚持并使之不断完善”^③。我们也深信，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进一步贯彻落实，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这一制度必将更加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注 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278页

③、④、⑤《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7页；368页；258页

⑥、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7页；第765页

⑧、⑨、⑩、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3页；第957页；968页；970页

⑫、⑬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第356页；363页

⑭彦奇主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第59页

⑮肖超然、沙健孙主编：《中国革命史稿》第415页

⑯邓伟志：《多党制在中国》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

⑰、⑱陈旭麓、姜义华：《中国革命史教程》第390页；第428页

⑲《中共党史通讯》1990年第14期第5页

⑳、㉑、㉒、㉓江泽民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载中共中央统战理论研究会编：

《统战理论研究》1990年第6期第32页—36页

- ①⑨、③⑨邓小平《目前形势和任务》，1986年1月16日
- ②⑩邵宏华：《中国民主党派与现实政治格局》，载于1989年9月12日《团结报》
- ②①、②⑤、③⑩、③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 ②③、②⑥《中共党史通讯》，1990年第9期
- ②④1988年12月20《团结报》
- ②⑦、②⑧、②⑨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载于1989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 ③③、③④、③⑤《我国统一战线工作出现新局面》，载于1990年6月9日《人民日报》
- ③②民革中央委员尚丁谈民主党派，载于《团结报》，1988年2月23日
- ③⑥张华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上册，第288页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编。
- ④⑩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第22页